

论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

任平

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援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初心,同时也鲜明地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以及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立场和中国尺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漫长历史中、特别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表现为欧洲起源的世界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伟大继续,而且具有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更是逾5000年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继续,因而是两者在当代中国融合的产物。我们不能偏爱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尺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看作是起源于欧洲,遵循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演化逻辑的舶来产物,而对中国原生态社会主义千年思想史脉络视而不见。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有理解的自我遗忘。从远古文化遗存、《诗经》到儒学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思想、道教的《太平经》及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普度众生式的共产主义等等,中国古代思想蕴含着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从根基、内容和作用都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类似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主题词 社会主义思想史 中国立场 中国尺度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

任平,苏州大学教授 2151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援用《礼记·礼运》篇的经典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初心和政治抱负,同时也鲜明地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以及丈量、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立场和中国尺度。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12&ZD108)阶段性成果。

果。”^[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这一重要判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国传统,并将时间轴上溯至5000年前。因此,确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何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与“魂”,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并重写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双重思想资源和双重尺度;第二,中华文明5000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与“魂”;第三,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重思想资源与双重尺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或资源具有中外双重性而非单一性。丈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间尺度同样具有中外双重性而非单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具有国外思想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即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国外思想来源,具有欧洲、日本、苏俄、南洋等多种路径,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依然是苏俄路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列宁主义主要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就是发端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从这一源头上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其著作《乌托邦》问世的1516年,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元年,距今有502年的历史。同时代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著有《太阳城》,1633年出版)以及德国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著有《论据充分的辩护词》)等,共同开辟了早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先河,为后来继承者所景仰。从那时起,空想社会主义经过中期(欧洲18世纪)法国梅叶(著有《遗书》,1730年流传,1864年完整出版)、摩莱里(著有《自然法典》,1755年出版)和马布里(著有《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76年出版)以及巴贝夫到后期(19世纪)法国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进而到法国的埃蒂耶纳·卡贝、路易·布朗基和德国的魏特林等,终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资本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变革中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进而经历十月革命和中国化,完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中国化、从历史到当代的沿革逻辑。这一500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虽然最终指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尺度的构成依据源于国外,而没有与中华文明的5000年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对接。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一个两大文明融通、两大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对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合,即开辟了实践路径,同时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传统的结合,即形成了文化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具有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产物,而且也是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通的文化硕果。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最高产物,与东方的中华文明融通、对接,才真正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境域传播,必然受到受体文化的转录和翻译。而一个文化境域之所以能够高度接受另一个文化的思想,两种文化之间必定具有可融通的基因。这就是文化解释学的前理解结构问题。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作为西方文明积极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被东方文明圈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所接受并迅速成为他们的指导思想。这就需要深度挖掘中华文明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理解基因:这就是存在于、贯穿于5000年中华文明中的古老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与这一传统对接、相通和融合,进而很自

[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360页。

然地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当作一种新的、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接受。正是因为存在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发展才有强大生命力。这一生命力不仅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对中国实践问题的科学指导性,而且还取决于中外文化中社会主义基因的相容性。正是因为存在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才获得了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更深厚的思想滋养和特色内容的融汇,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更是一种有5000年文明的“根”与“魂”支撑、滋养的文化体系。正是因为存在这一传统,5000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就有了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形态,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时间最长、没有中断或断根的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

因而,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然具有两大思想资源和传统。一是欧洲的,二是中国的。我们决不能数典忘祖,只讲社会主义思想史500年的欧洲传统而忘却5000年中国传统。不理解中国传统,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语境,就不能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来源与形成机制,更不能文化自信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原创性贡献。

两大传统不仅是基本事实和研究对象,同时也蕴含着两种视域、两种立场和两种尺度。我们绝不否认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欧洲传统,同样我们不排除国外马克思主义从欧洲视域、欧洲立场出发用欧洲尺度来看待、研究、把握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间轴。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间轴,不单指这一思想史所跨过的时间长度,如500年或是5000年,而且指这一时间之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历史分期、各个时期历史形态和总体呈现的规律性的、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对欧洲发端的500多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间轴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见解各异。但是作为中国学者,还需要回归中国本位和中国立场,用中国视域审视、研究、梳理由中国发端的50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建立丈量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5000年时间轴的中国尺度。

建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内在地需要从欧洲立场转换为中国立场。这一立场的转换,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发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看作是原初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同时更是5000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的时代产物;不仅存在着由外而内的500年外源性传播演化逻辑,而且存在着中国本土的5000年内生性发展逻辑;不仅存在着欧洲发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中国、从历史到当代的几大转变,更存在着中国社会主义从传统向现代、从空想向科学、从理想到实践、从过去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建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意味着中国视域的出场。在资本全球化二元分裂为“中心-边缘”的世界版图中,作为资本逻辑反思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想,肯定是先发端于欧洲,然后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东方扩展。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的国外视域似乎就成了一种外源性的、带有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必然的先在地位和本位视域。中国本位立场、中国尺度都被遮蔽了。而随着中华民族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了强起来的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才能真正文化自信地提出中国视域,才能够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出发,重新独立地审视我们自己民族5000年的历史,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全过程,建立民族自己的理解坐标。

建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全面反思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全过程,发现和把握其发展演变的逻辑,包括其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演化分期、历史脉络和连贯规律、基本特点和历史价值。

建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更具有世界意义。在中国尺度和欧洲尺度关系版

图上,中国将不仅改写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图景,更为其在世界历史版图中第一次高举具有5000年文明之根与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提供坚实的历史根据。

二、中国50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基本脉络及其出场形态

坚守中国立场、用中国视域来系统观察、研究、把握中国5000年文明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建立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国尺度,是一项系统的理论工程,需要专题加以梳理和研究。

19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由来已久。康有为借助于《大同书》结合“公羊三世”说来阐发自己的变法维新旨要,梁启超在《欧洲游影录》中介绍麦克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时就曾经提到中国的大同思想传统。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新儒学诸公对孔子学说、孟子学说以及“内圣外王”思想的评论、王德有的《老子演义》、陈鼓应的《老子注释及评介》、马国均关于老子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以及诸多关于大乘佛教教义经典的研究中,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述。然而,这些关注和研究同样表明,它们还处在零散、碎片化的状态,还没有被整合进一种一以贯之的5000年伟大传统之中,并作为考察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视域和中国尺度而在场。中国50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因此,学界研究的一大使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国视域和中国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史脉络完整地建构起来。

客观地说,这一思想史散落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隐蕴于汗牛充栋的无数古代典籍之中,需要专门筛淘和整体梳理。限于篇幅和个人学识,本文只能撮其大要而言之。这一思想史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五种形态。或者说,我们需要从这五个角度去深度理解和挖掘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传统。

第一阶段或第一形态是远古时代。经过考古学界初步发掘考证,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大地湾文化,是中国黄河流域最早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上溯至60000年前。可以推断,在中华大地上,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群落曾经存在了数万年以上。但遗憾的是,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其活动痕迹没有扛过漫长岁月的侵蚀而消散,缺乏远古社会那些标志着思想和精神在场状态的遗存根据,我们无从解读他们的思想符码,因而无从知晓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那个时代对当代人来说是一个悠久而缺语、尚未被打开的神秘时代。然而,在近5000年文明中,考古成果已经部分显露出这一社会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上的痕迹。新石器时代留下的在各种器具上镌刻的纹样图案、壁画和陶罐花纹,有集体狩猎、祭祀和欢乐的场景,其集体、群体活动折射出原始的共同体关系。而后,在中华大地进入阶级社会的进程中,被残酷压迫、剥削的下层民众、奴隶们,以诗歌、神话、故事等方式留存着对远逝的原始社会的美好印象和眷恋之情。在生产发展导致较大规模的产品剩余前提下,私有制、阶级社会必然起而代替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必然代替野蛮。但是,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必然又使得被压迫阶级在意识上产生对于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无剥削、无压迫制度的眷恋。中华文明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场根源之一,就是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社会中,被压迫阶级保有某种对原始社会的印象和眷恋,并借此来批判、抵制和反抗进入阶级压迫和不平等社会的现实。在残酷压榨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骄奢淫逸,下层民众温饱不得、朝不保夕、困苦不堪,因此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和睦、生活安逸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的状况有着深深的眷恋。《诗·大雅·民劳》就有“民亦劳止，汙可小康”一语。《山海经》中有对于女娲氏等养育中华民族的母系代表的初民社会的描写。甲骨文中一再出现的“共”“众”“人”的差别字样，也反映出群体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差别。

第二阶段或第二形态，就是由先秦到两汉社会大动荡、大分化阶段，由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到两汉国家稳定治理时代中出场的社会主义思想。老子《道德经》对于阶级社会那种恃强凌弱、不平等的憎恨，对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上善若水的各种观念的推崇，都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某种眷恋因素。老子的政治哲学理想就是“上善若水”和“无为而治”，强调“大道之行”。认为上古公有制社会里，大道通行于天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个体身心都处在倚重原初无我无他的和谐无争状态，没有私有观念，也无需行仁义规范。这是因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庄子描述“至德之世”时也曾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以为赐。”（《庄子·天地》）“至德之世”说的是远古公有制社会，其民众淳朴而无私，与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智开启而因私狡诈的文明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其褒奖和鞭挞对比之意极为鲜明。无论老子和庄子，应当都对远古公有制社会状况有深刻的认同。《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均衡、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墨子强调“非攻”“兼爱”“尚同”的理想，也明显带有这一意识的痕迹。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准国家时代特别漫长，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胞族（以部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社会）长期存在，在准国家产生后，甚至是秦汉国家稳定建构以后依然没有解体。这是中华文明史上胞族式原始社会的存留形态，其向以地区性阶级统治为特征的国家转变是不彻底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胞族社会与社会日益脱离，并与建树其上的以国家地域性为特征的阶级统治并行不悖。胞族社会甚至成为支撑王法国家的微观基础。对于公有制社会的大道，无论儒家、道家都心向往之。《礼记·礼运》篇中记述，孔子率学生登高台并感叹，学生言偃问之，孔子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戴圣为之解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上述话语对大同社会的纲领、基本特征作了清晰的描述：人人得到社会奉养，全体居民彼此无私关爱，安居乐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财产共有，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社会和谐。“大同社会”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理想的专有名词。郑玄注《礼记正义》中释义道：“大道，谓五帝时也。”这一时期，是以“大道之行”作为最高原则的原始社会主义末期思想逻辑的奠基期和建构期。

第三阶段或第三形态，是儒释道发展中的成熟理想形态。秦汉之后，中国经历魏晋乱世而进入隋唐盛世，继而经历五代十国动荡进入宋明时代，中国乡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长期存在的、生命力强大的胞族社会，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成为自治的组织，而与国家等阶级统治机关相呼应，表现为“家国分治”而又在规制原则上呈现“家国一体”的关系，而且在生产方式上常常带有原始公有的某些残余（家族公田）。因此，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都未完全摆脱血缘治理结构而彻底进入地域治理结构。家族关系不仅没有因为进入阶级社会和建立按照地域原则建立的、超越于胞族社会之上的国家而消亡，相反，国家反而是部分建立在各个胞族社会之上的公共机构。因此，反映“亲亲为大”血缘伦理的儒家学说能够长期在精神上宰制中国。而血缘伦理，本质上自发自带有远古时代的大同思想。因此，历代儒学大家都具有“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都具有“天下大同”的理想。随着中国农耕社会发展的日臻成熟，封建大地主、大豪强阶级的残酷掠夺和压迫，导致社会崩溃，使大量小农破产成为流民，农民阶级奋起

反抗,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历史出现了“周期律”。总结历史教训,为了更好地教化统治者,思想家们谋划了超越阶级对抗的理想社会,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南柯一梦中的“大槐安国”的理想、大乘佛教关于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等。佛教团体主张个人出家,财产公有,过集体生活,实行着另一类的原始共产主义存在方式。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绝不成佛”的佛教共产主义者的宣言,具有力图超越阶级社会,达成无压迫、无剥削、富足、安宁、悠闲、惬意的理想社会的情怀。这一系列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体现了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内容。

第四阶段或第四形态,是奴隶和农民起义革命运动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奴隶和农民奋起反抗阶级压迫,举行大规模起义,必然有自己的革命主张,即批判阶级剥削和压迫、追求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态。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是其朦胧地、自发地呼唤出的涉及经济和政治平等解放的口号。《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传说东汉于吉所传共170卷,为早期太平道所奉的主要经典,体现了黄巾起义等汉末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其中宣扬散财就穷、自食其力的劳者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太平经》第一百零三篇中说:“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本非独给一人,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肯周穷救急,使万家乏绝。”这是主张“财物共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三国志·张鲁传》中也记载了道教实行的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群众性医疗运动等农民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场景。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2月7日、10日在对《三国志·张鲁传》的两个批语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又说:“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1]从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中国古代历史上,每一次贫苦群众造反运动,都曾经多多少少触及到原始社会主义理想。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体现了太平天国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这一脉思想资源的特点是不仅有思想,有纲领,而且有相当的革命实践。

第五阶段或第五形态,是在资本全球化东侵进程中对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和列强侵略挑战的应战,包括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黄强等在介绍引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的反思、研究、借鉴、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开了现代以来化古为今、承前启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先河。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系统挖掘和认真总结。

正是在上述5000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毛泽东、陈伯达等人系统结合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历史,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基础。

[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7页。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出场具有以下几个本质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之源更悠久,时间轴更长。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因而,中国的远古社会的精神传统历史更为久远。尽管在中华大地上,上古时代先民的相关思想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从现有对大地湾等考古遗存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窥见远古社会群居生活、公有生存的场景和样态,看到先民用制陶涂鸦、壁画、岩画等最初的精神符指方式表达出来的意义。从本文指认的五种形态或观视的五种角度,我们可以系统地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史图景。根据这一图景,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理想目标。根据这一图景,我们可以自信地坚守中国立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国尺度。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当然属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出场语境和历史根基不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是对一般剥削制度的批判和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制度的谋划,而且更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批判和对后资本社会制度的向往。与此不同,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更传统的社会主义,它主要是奠基于这样一种混合体:其混合了进入阶级社会后没有完全瓦解的那个原始公社胞族社会残余的意识形态、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自发反抗意识和农民式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它虽然也有反抗、批判剥削制度,憧憬平等自由无剥削制度的一面,但是在本质上还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专有批判。因此,除了近代那些思想之外,大多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农民起义中表达出来的思想,都是对于一般阶级剥削、一般阶级压迫、一般阶级差别的愤恨和反抗情绪的表达,是对某种超越一般阶级对立社会的愿望的表达。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成分更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原始公有意识和血缘伦理情怀。此外,更希望通过各种神教意识形态方式发声,除了儒家而外,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用某种宗教形式来表达的。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所说,其“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不能不加批判地直接成为我们的思想因素,而是必须要经过深刻、彻底、全面的批判性转化。

第四,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完全进步的。尽管其对剥削制度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进步的借鉴意义和启迪意义,但是,其也往往成为被文明社会进步所淘汰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挽歌,不是向前进,而是要倒退,表现为历史的反动。老庄学说、宗教情怀,以及各种带有开历史倒车成分的思想,都具有这样的历史性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地指出的那种“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甚至更古老社会烙印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一份遗产,不能用抽象法,而是要用辩证法来对待。我们既要看到其中具有的反剥削反压迫、财产公有和集体占有、人人平等积极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要看到它们被嵌入在宗教、迷信和各种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思想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事实,用历史辩证法思想之剑来斩断这一形式,拯救其中的合理思想内容。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科学分析和冷静对待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中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若干内容,例如,关于公有制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内容之一,就是主张公有制,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点。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的原始公有制形式相对于文明社会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而言恰好是历史的倒退。佛教团体的公有制、张鲁的共有制主张、太平天国的主张等大多带有小农式的安贫守穷(反对发展)、平均主义(反对任何差别)、注重分配正义(分浮财)而不注重生产正义的强制性(非自由)的色彩,

[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因而它们在历史形态的意义上绝不能直接成为我们今天的直接现实。绝不是任何公有制都是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的公有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的“自由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有制。每一个时代的公有制都必须与这一时代的基础相适应,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我们既要看到所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共性,更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个性和中国特色,不能满足于仅仅看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是否“公有”,更要看是什么样的“公有”,是否是与社会化全球化大生产相匹配的、自由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有”。再如,关于用国有形式来实现公有制,也要仔细分析。历史上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都出身于农民起义,起初也都带有朴素的农民式社会主义思想情怀,主张财产公有、平均地权,甚至在建国后用国有形式来实现财产公有。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沦为封建帝王和少数统治阶级的财产。而民国的国有资产则直接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资产。这些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全民公有制可以采取国有形式,但是反过来国有形式并不必然保证就是公有。如果缺乏周边的严格的制度限制条件和监督条件,国有资产同样可能变成少数人任意占有的资产,变成占有者腐化堕落的经济来源。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三、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本质分析与世界意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存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当年曾经引起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4年第2期)所写的“国际述评(一)”中,就曾经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概念。原文指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眼: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指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多年来,学界曾经就此展开长期争论,涉及两个问题:1. 这是否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称谓及其对象的存在? 2.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的评价究竟采取肯定还是否定态度? 关于前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过是转述传教士的说法,并不表明他们认可这一称谓。另一种见解则指认马克思恩格斯完全在存在的意义上称谓中国社会主义。关于第二个问题,持肯定态度说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指认为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黑格尔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重要来源,因而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予以肯定的。持否定见解说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是“最保守最反动的”存在体,应当加以否定。笔者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持肯定说或持否定说,都主要涉及评价,但是并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这一事实。其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早于欧洲资本逻辑的扩展。正因为如此,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对于历史进步的资本生产方式来说,是过时的、反动的和保守的,必将被社会变革所摧毁。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包括带有封建纹章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文献进行无情批判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进步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批判、嘲讽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并无不妥。这甚至也启迪我们:中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第2版,第276-278页。

国传统社会主义绝不等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有着若干历史局限甚至在历史上起过“开倒车”作用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决不能全盘接受和照着讲,而是要在批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并不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一传统思想的否定和批判,我们就不承认它的事实存在,将之仅仅当作对欧洲传教士叙述的一种转录,就不能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其优秀思想传统加以有选择地汲取和有批判地继承。

因此,对待中华文明5000年中社会主义传统思想史两种态度都需要摒弃。一种是站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立场上,全面否定和抛弃中国立场、中国视域和中国尺度,否定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一种则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立场上,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全盘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史内容,不适当地抬高古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地位而贬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复古主义的情怀。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正确态度。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本质上是各种中国传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致性和一脉相承性,因而有从前向后转化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寻找其内在的一脉相承的思想史逻辑线索,将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沿革的整体历史进程,增强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与“魂”的自信。但是两者在历史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基础、所承载的阶级、所表达的社会内容、所要求的变革方向、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和实现路径上,却具有历史的、根本的、原则的重大差别。因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要经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改造中、在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洗礼中发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本质上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站在世界历史坐标上,对于发端于华夏大地长达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发展、演化的历史图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考察。

丈量社会主义思想史时间轴的中国尺度与欧洲尺度之间原则性的、重大的、根本的差别以及中国尺度的世界意义何在呢?

首先,中国尺度时间跨度大,历史悠久,但是欧洲尺度更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尺度只有与欧洲尺度结合才能显现从传统走向当代的完整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进程。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史并不是直接内生地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而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中介作用。究其原因,当然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出场的历史根源和阶级立场不同。5000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是经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下层民众和失意士大夫针对前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反思和批判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主要元素是对远古公有制社会状况眷恋的残余意识。与此不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产生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罪恶和危害的自发反抗,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自我分裂中受苦受难阶级的思想表达。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阐述的:“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空想社会主义则表明:“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2]比起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更接近科学社会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第780-781页。

主义,思想表达更现代、更系统,其包含的合理因素更丰富。但是,中国尺度时间轴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理想,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而且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的思想精华,今日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民群众反阶级剥削和压迫、争取解放伟大初心在当代的表达。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充分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同时充分继承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精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出场。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大思想资源、两大传统当代融合的产物。在两大尺度、两大坐标交汇点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犹如两种文明之河汇成一条大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受到中西汇通的两种文明资源的滋养,因而其发展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并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前景。

其三,中国尺度的世界意义还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都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思想都具有丰富的、甚至填补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空白的意义。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受到其所处时代的规约而表现为历史的出场形态。评价每一个历史形态的意义都需要有历史的辩证法眼光,因而都需要剖析其超越历史情境指向当代的合理意义,使其可为我们所借鉴;同时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而不能完全照搬。诸历史形态之间都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把握。

[责任编辑:洪 峰]

On the Chinese Scale for Measuring the Timelin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Ren Ping

Abstract: Xi's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quotes, "we should pursue a just cause for common good," to illustrate CPC'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anifest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osition and the Chinese scale for measuring the timelin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es not just fall out of the sky, but evolves in a long history, in particular from Chinese 5000 years' civilization. It does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500 years' European socialist tradition, but also has the ancient Chinese socialist tradition of over 5000 years; thus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in the present China. It is not advisable to favor the 500 years' history of socialism originating from Europe, tak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merely a foreign product from Europe with ignoranc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riginal socialist thought. The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contains systematic socialist thought dating back to ancient cultural legacy, *The Book of Songs*,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one community of the whole world", the Taoist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the Buddhist claim of equality of all living beings, and Communis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ist tradition is different in base, content and role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transit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ist thought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alogous to that from European utopian socialism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has taken place.

Keywords: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the Chinese position; the Chinese scal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ist thought